

范蔚 王福生 总主编

陇上亭人文存

孙克恒卷

陇上学人文存

孙克恒 卷

孙克恒 著 孙 强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孙克恒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 孙克恒著 ; 孙强编选.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226-05227-3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孙… ④孙…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诗歌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C53 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381号

出 版 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肖林霞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孙克恒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孙克恒 著 孙强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7 字数 271 千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5227-3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咸 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 辑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珪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林 铎
主 任：梁言顺 夏红民
副 主 任：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 员：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 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 1949 至 2009 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 年 12 月 26 日

编选前言

孙克恒(1934—1988),山东烟台人。从小喜爱文学,早年接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苏联文学,深受鲁迅、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影响,在胶东公学和烟台一中读书时,即为《青年报》《山东青年》写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学习期间,参加“北大诗社”,1956年作为“北大诗社”的代表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扩大理事会闭幕晚会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自愿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分配至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调兰州艺术学院,1962年到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为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甘肃分会会员。孙克恒先生50年代开始从事诗歌研究与评论,著有《谈诗和诗歌创作》(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现代诗话》(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当代西部新诗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发表诗歌、论文70多篇,是中国当代有影响的现代诗歌评论家,是中国西部文学颇有声望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推动者。

—

孙克恒的新诗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评论不免受到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和政治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影响,这是个人的



局限,也是时代使然。新时期以来,他的思想更为敏锐,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基本摆脱了政治化社会历史批评的窠臼,更多地从历史和美学的立场进行评论和研究。1980年他发表《雨巷诗人——戴望舒》一文,对戴望舒诗歌的情感基调和艺术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率先肯定了戴望舒诗歌的历史价值,认为“从三十年代的诗坛,到四十年代如《诗创造》《中国新诗》的许多诗人们,甚至从近两年涌现的一些青年的诗作中,都可以觉察到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风的影响,甚至说预期潜在的影响”。80年代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时期,对戴望舒的“重评”开风气之先,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以及不断开拓的精神追求。1987年他发表了长篇论文《主体感应的变异:〈现代〉及其诗人群》,分别论析了以《现代》为阵地的诗人群体戴望舒、李金发、艾青、林庚、金克木、陈江帆、李心若、玲君等,从现代诗歌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现代诗派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现代诗派注重内心体验与个性的自我袒露,感应变动的现实,传达了现代的都市景观及其文化心态,也向读者提出了改变传统的鉴赏心理、接受习惯的问题。同时,他也强调不能把新诗中的现代倾向看作对现实的诗和浪漫的诗的反动,“实际上它正是牢固地扎根于我们发展着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之中的一种更为执拗、更为深刻的诗歌美学的继续和延伸”。对现代诗派现代因素的挖掘和阐释,对诗人主体意识的重视,都表明孙克恒摆脱了政治化社会批评的模式,形成了富于个性和注重审美的批评方法。

孙克恒的新诗研究涉及了现当代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现象,从冰心、周作人、鲁迅、朱自清、郭沫若、殷夫、戴望舒、冯雪峰到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唐祈、昌耀,从白话诗运动、小诗、叙事诗、现代诗派到天安门诗抄等等,可谓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在研究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现象的同时,孙克恒对一些学术界容易忽视或鲜为人

知的诗人及诗歌现象也给予很大的关注,注意发掘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曾选进沈玄庐的一首长诗《十五娘》,并认为它是新文学中的第一首叙事诗。作为一首开创性的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却少有论及,1979年出版的《新诗选》也没有选进这首诗作。孙克恒的《初期白话诗二题》一文,通过文本解读,认为它不仅扩大了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题材范围,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价值问题,而且也为叙事诗的创作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经验,作为现代白话诗歌运动中的第一首叙事诗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关于冯雪峰研究,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湖畔诗社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理论,40年代的狱中诗篇少有论及。孙克恒的《〈灵山歌〉:一个不屈的灵魂的自白》一文,结合创作的背景,系统地论述了《灵山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并和前期的诗歌作了比较。认为《灵山歌》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思想情操的真实再现,也是一座不屈的心灵的丰碑,在我国新诗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也曾撰文论析了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年仅24岁牺牲的青年诗人李辉唯一的诗集《十月的歌》。这些研究弥补了现代诗歌研究中的不足,体现了独到的文学史眼光。

在对具体诗人和诗歌现象的评论中,孙克恒善于从中外诗歌传统,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出发,探究新诗与古典诗词的复杂关系,体现了一种开放的诗歌观念和独特的文学史意识。不论从构思或语言形式看,词曲的影响甚为明显,是五四初期不少白话诗作的普遍特点。朱自清在谈到沈玄庐叙事诗《十五娘》的缺点时,认为它“词曲调太多”。孙克恒却认为,从具体作品看,词曲调对《十五娘》却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因此,他不是从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机械地看待新诗中的传统因素,更注意从具体的审美效果看待传统因素的积极效果。在论及戴望舒的诗歌成就时,也肯定了戴望舒诗歌中的传统因



素：“他能在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基础上，独树一帜，自创一格，白话诗创作到他手中，已经成熟到敢于回过头去，大胆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诗风，使其不落痕迹，又保有它活泼的神韵，同时更融会以现代诗艺变化的潮流，用以丰富现代白话写诗的表现手段。”关于小诗的兴起，在论及外来因素的同时，他也强调传统的渊源不容忽视。对新诗中传统因素的辩证分析显示了独特的审美意识与历史意识，对当下新诗创作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评论道：“甘肃的孙克恒，是西北地区诗论家的一位代表。”作为当代颇具盛名的诗歌评论家，孙克恒的诗歌研究既能以诗人之心深入文本，体现了批评主体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又能从作家和社会历史的角度做到“知人论世”；既能从中外诗歌传统展开分析论说，又具有更为宏阔的理论视野，立论行文显示出高超的理论水准，形成了独特的批评风格。

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崛起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围绕着当代诗歌和新诗传统的关系，诗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以及如何吸收借鉴外国诗歌的表现方法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更是将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引向高潮，孙克恒也于同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新诗的传统与当代诗歌——兼评〈崛起的诗群〉》一文，随后，他又撰写了系列论文，积极参与了相关的论争。和章明、臧克家、程代熙等人的政治化批评不同，孙克恒立足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传统，勾连古今，放眼中西，以宽容的态度，从学理的角度，探究了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道路问题。

在朦胧诗的争论中，如何看待当代诗歌和新诗传统的关系是一

个首要的问题。徐敬亚认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人在主导思想上是脱离现实的,诗的情调仅仅再现了空幻的自恋和哀怨,在诗的感受和表现手段上基本没有冲破平铺直叙的总框子。以后的外族入侵、国内动乱,终于使中国现代诗歌产生的一点点可能性遭到了泯灭。由于对现代主义的推崇,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了质疑,尤其对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所有的诗人都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产歌吟的汪洋大海之中。徐敬亚对新诗传统的见解有许多偏颇之处。针对徐敬亚的论述,孙克恒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肯定了中国新诗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认为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大批诗人,他们有极高的中外文化修养,有极其诚实而敏感的精神世界,又异常忠实于对艺术的孜孜探求,创作上具有明显的不同风格和个性的烙印。在他看来,把五十年代诗歌归结为“中间铺陈”、“结尾升华”的传统诗歌套式,其实也是不公平的。关于当代诗歌与新诗传统的关系,徐敬亚强调诗歌的“现代倾向”就是反传统,认为“一种艺术倾向的兴起,总是以否定传统的面目出现,总是表现反对原有旧秩序的强侵入”。孙克恒在肯定新诗变革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强调新诗传统是现代诗情的宽厚肌体:“这种发展同样也只能在自身传统基础上更勇猛地跨越,以超过前人的新突破、新贡献而丰富民族艺术宝库,正像不能割断历史一样,对于发展中的自身传统,也是没有多少主观选择性的。”实际上,从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看,朦胧诗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和使用完全是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回声。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是当代新诗赖以发展的基础,朦胧诗的崛起,其实是新诗美学原则变革的结果,正如孙绍振所言,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屑于